

---

# 文化再生产与身份认同： 以澜沧拉祜族的旅游业发展为例<sup>1</sup>

艾菊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发展文化旅游过程中，对拉祜族文化进行了再生产。这一再生产行为不仅造成了拉祜族文化的变迁，而且对其族群身份的认同也产生了影响。再生产的文化往往并非完全杜撰，而是与过去的传统相联系，这就会形成新的文化传统，加之资本的介入，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缘故，在文化的再生产和文化消费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展演和强化，逐渐塑造一个群体的典范文化，从而进一步强化民族边界和自我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在民族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发明的传统”是重要的方法，对于理解民族现象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澜沧拉祜族；文化再生产；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867X (2016) 03 - 0042 - 06

全球化尽管使人、物资、信息、技术和文化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速度之快令人讶异，随着网络的普遍，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在几分钟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大量的民族志研究却显示，人们所担心的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情况却并没有发生。相反，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文化产业的兴起，以文化为依托的旅游观光成为旅游产业的重头戏。这使文化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反而促使文化在全球化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本土化的再生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多，大多数研究者所讨论的问题是在旅游开发背景下，文化的再生产所造成的文化变迁，以及对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消极或者是积极的影响。<sup>①</sup> 旅游人类学对这方面的研究更是相当丰富。与此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人们为了争取更好的经济效益而对文化进行再生产的时候所造成的文化变迁，也有可能对族群身份的认同产生影响。<sup>②</sup>

目前学界大多认为族群认同是一种主观性的认同，特别是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 Gorman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更是这种主观性认同的代表，认为族群是构建出来的共同体。然而人们发现即使族群是想象或者构建出来的，文化依然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这是无可否认的。韦伯（Max Weber）认为，无论是体质上还是文化上的差异，都可能是族群身份的标志。<sup>③</sup> 文化常常被认为是社会的既定资赋，在群体中习得并传承下来，因而使同一群体的人因拥有相同的文化因素而具有根基性的情感联系。不过在主观性的族群认同背景下，人们可以依照主观的族群认同意愿，发明或者创造出某种文化来标明自己的族群身份。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认为文化性解释的传承，甚至可以使不同血缘的人认同于该群体。<sup>④</sup> 但是这种发明或创

---

<sup>1</sup> **【作者简介】** 艾菊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课题“21 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项目编号：13@ ZH001）子课题“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阶段成果。

<sup>2</sup> ① 翁乃群：《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再生产：以纳西文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关系为例》，王铭铭主编：《人文世界》第一卷，北

造的文化并不能是凭空想象出来, 霍布斯 鲍 姆 ( Eric Hobsbawm) 在 其 《发 明 的 传统》中认为很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不过是近现代才被发明出来的, 但是却被人们作为传统接受并推崇。但这种发明的传统并非与过去没有任何联系, 而是暗含着与过去的连续性, 而且只要有可能, 这些被发明的传统就尝试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sup>①</sup> 通常这些新发明的传统往往使用旧材料构建起来, 比如传统民歌增加以相同的风格写成的新歌曲, 或者包含一些新的内容等。<sup>②</sup> 而且这样的传统发明都是有着政治或者经济的目的。在以文化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背景下, 显然所发明的传统或者说是再生产的文化产品正是为着经济利益的缘故。同时, 霍布斯鲍姆认为这些新发明的传统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真实的或者虚假的共同体具有凝聚力, 或者使该团体的成员资格得到确立。<sup>③</sup> 而且他特别论述到传统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与近现代的 “民族” 观念相联系, 现代民族往往发明与过去相联系的传统, 而构建出一个 “古老的” “自然的” 的共同体。<sup>④</sup> 也就是说, 在民族的构建过程中, 发明的传统是重要的方法, 而且对于理解民族现象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上世纪 90 年代, 云南提出 “建设文化产业大省”,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作为一个以拉祜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 文化资源丰富多样, 自然成为潜在的经济资源。在政府的主导下, 开发以拉祜族为主的文化资源以发展旅游业就成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发展的主要方向。在这个背景下,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拉祜族的文化再生产不仅有着传统的发明, 而且对于拉祜族的身份认同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 一、拉祜族文化再生产与身份构建

都市人厌倦了都市嘈杂和快节奏的生活, 对于少数民族有着一种 “异文化” 的想象, 所谓的古朴、原生态、慢节奏、神秘等是人们想象民族地区与都市迥然不同的生活氛围。2006 年普洱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普洱 “绿三角” 旅游区的设想, 即澜沧、孟连、西盟绿三角旅游环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以拉祜族文化为依托, 其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建设 “世界拉祜文化中心”, 所要实施的战略是打造 “拉祜文化名县”, 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就是 “拉祜文化”。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到了要开发 “民族文化体验产品。依托澜沧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 开发以体验性、参与性、娱乐性为主的民俗体验型旅游产品……”

如果要建设 “世界拉祜文化中心”, 首先所要界定的就是什么是拉祜文化。从目前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城建设完成的一轴四景, 即: 拉祜文化展示中心、扎娜傣阁、拉祜风情园、世界拉祜朝圣地等四个景点来看,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把拉祜族创世史诗 《木帕密帕》中所记载的创世传说的一些因素提取出来, 塑造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符号, 来代表拉祜族的文化。

### (一) 葫芦中诞生的同根同源的民族

拉祜文化展示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占地 409 亩的大广场, 硕大的金色葫芦矗立在广场中央, 拉祜族创世史诗 《木帕密帕》记载, 人类是从天神厄莎所种的一个葫芦中诞生的, 因而将葫芦作为拉祜族的象征符号。在靠近广场的外围有 12 根生肖图腾柱, 以

---

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2 ~ 24 页; 宗晓莲: 《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 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② 麻国庆: 《全球化: 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 《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③ Max Werber: “What is Ethnic Group”, in Montserrat Guibernau, John Rex ( ed. ),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15 - 26.

④ Charles Keyes: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Charles Keyes ( ed. ), Ethnic Chan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p5.

此来表现拉祜族的生肖属相。根据《木帕密帕》的记载,是老鼠和云雀将葫芦咬破,从而使人类的始祖扎迪和娜迪走出葫芦,因而在广场东西两处出入口分别设计了金鼠门和银雀门。广场四周的建筑则设计成拉祜族干栏式建筑的斜坡屋顶,每栋建筑上都有标志性的金色葫芦浮雕。从广场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了拉祜族的标志性符号——葫芦,以及老鼠和云雀——帮助人类从葫芦中诞生的重要功臣。设计者的初衷就是要建成一个可以表现拉祜族文化的广场,“展示拉祜族的‘祖’和葫芦的‘根’文化”。<sup>③</sup>不仅仅是葫芦广场,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葫芦的标志,县政府的大门口有两只巨大的金色葫芦雕塑。政府宾馆——也就是扎娜愬阁(“扎娜”,是扎迪和娜迪的合称;“愬阁”,意为生活的地方),其房屋也在屋顶和房屋墙面的装饰上塑有葫芦的造型,以突出拉祜族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在扎娜愬阁园区的正中央处塑有扎娜的雕像,扎迪和娜迪在葫芦前吹芦笙和跳舞,意味这扎迪和娜迪从葫芦中诞生,拉祜族都是扎迪和娜迪的后代。不仅是这些特意打造的标志性景点,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随处可见这些代表拉祜族的标志性符号,路灯上面也有葫芦的造型和老鼠与云雀的雕塑,很多建筑的外立面上也要塑上葫芦的浮雕,或者画上葫芦……所有这一切向人们展示着,拉祜族——一个从葫芦中诞生的民族。通常来讲,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区分的时候,往往会寻找代表这一群体的标志性符号,或者是体质上的,或者是文化上的,正如韦伯所言,这些差异,都可能成为群体身份的标志。哪怕这种差异相当细微,为了表示我群与他群的区别,人们往往会夸大这些细微的差异,从而成为我群的标志。在拉祜族创世史诗中,葫芦孕育了拉祜族的祖先,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符号,因而将孕育拉祜族祖先的葫芦作为拉祜族的标志性符号,代表着所有的拉祜族有着共同的祖先。从而塑造出世界拉祜族的共同起源,强化共同的血缘身份,更是让世界上所有的拉祜族有了同根同源的根基性联系。也有研究者认为正是拉祜族对于葫芦起源的深化认同造就了现实中拉祜族族群认同的基础。<sup>④</sup>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无时不在的葫芦时刻提醒人们,拉祜族是从葫芦中诞生的民族,澜沧是拉祜族的故乡。这正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对自己的定位,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打造成“世界拉祜文化中心”,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塑造成为拉祜族的发源地。“打造”和“塑造”两个词非常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是一场依托拉祜族文化为背景的文化再生产运动。

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只有代表性的符号并不能很好地吸引游客,这个符号还必须具有展演性,必须可以观赏,能够成为可以消费的文化产品,才能招揽游客。因此,借助葫芦这一符号,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打造出了葫芦节——即阿朋阿龙尼节。葫芦节并不是拉祜族的传统节日,同样是根据拉祜族创世史诗《木帕密帕》独创出来的一个传统节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1991年11月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召开的“拉祜族史”研讨会上,经过征求拉祜族各界人士的意见,创设葫芦节。根据《木帕密帕》的记载,人类的始祖扎迪和娜迪从葫芦中出来的日子是农历的十月十五日,这一天被认为是传说中拉祜族祖先诞生的日子。于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于1992年8月7日第九届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为拉祜族的“阿朋阿龙尼”,即“葫芦节”,希望能将葫芦节提升打造成具有世界性的“拉祜文化节日”。这是典型的霍布斯鲍姆所称的“发明的传统”,而且是为经济利益而发明出来的传统。后来,为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从2006年开始,葫芦节的过节时间调整为每年公历的4月8~10日,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县庆放在一起庆祝。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发展旅游业,与西双版纳傣族的泼水节、孟连的神鱼节、西盟佤族的木鼓节等节日的时间相衔接,使普洱“绿三角”的民族传统节日和西双版纳旅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民族传统节日和民族文化旅游的“黄金三角”。从旅游开发、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个“发明的传统”相当具有经济眼光,也确实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旅游发展添加了色彩。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葫芦节再一次强化了拉祜族的族群身份。葫芦并非是拉祜族的精英们杜撰出来的,而是创世史诗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这种与过去联系的

<sup>3</sup> ①(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②(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③(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④(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页。

⑤《新澜沧县旅游总体规划文本说明书》,第61页。

发明,使拉祜族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创世之初,从而使拉祜族人民可以将自己的血缘联系追溯到人类起源的古老年代,从而使世界各地的拉祜族建立起从根源上的联系,强化拉祜族的血缘认同。节日期间,举办各种与葫芦相关的活动,比如供葫芦、跳葫芦笙舞、跳摆舞、唱葫芦史诗、玩葫芦游戏等,这些都是将拉祜族原有的文化元素进行重新包装组合,形成新的传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一种强有力的仪式体系围绕着这些情况形成:节庆活动的帐篷、用来展示旗帜的建筑、摆放礼物的场所、游行队伍、鸣钟、舞蹈造型、鸣放礼炮、出席节日的政府代表、晚宴、敬酒和演讲。为此旧材料再一次被改造。”<sup>④</sup>节日中,人们身穿民族服饰,举行的所有活动毫无疑问要选择和展示拉祜族的各种文化符号,这些都在强化着拉祜族的族群身份。而且每年一度举行,成为一种仪式化和制度化的活动,不断唤起人们的民族情感。

## (二) 厄莎:共同的神灵

在将民族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所强调的必然是文化的差异性,尤其是作为边疆民族,更多地承载了人们想象中的边缘人群的形象。为了满足游客的猎奇和对古朴原始的追求,需要更多地将民族文化按照原始和古朴的想象来进行塑造。宗教是最能展现这种差异性和原始性特点的文化元素之一,于是原本在当地人心目中具有神圣性的宗教活动或者仪式也拿来再进行再创造和再生产,成为文化产品来吸引游客。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如丽江的纳西东巴文化,在丽江的旅游开发中,原本作为纳西族生活中神圣的宗教活动,成为了展演的文化商品,东巴表演和东巴经都成了表演性的商品以供游客消费。正是由于东巴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以及原始与古朴的形象成为游客特别喜爱的丽江文化旅游产品。<sup>①</sup>澜沧拉祜族的旅游开发,也是采用了同样的思路。

拉祜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最高天神是厄莎,在《木帕密帕》的记载中,是厄莎天神种下了那棵诞生拉祜族的葫芦。不仅如此,厄莎还创造了世间的万物,因而厄莎是拉祜族纪念和崇拜的天神。尽管如此,拉祜族并没有专门针对厄莎的祭祀场所,或者是专门祭祀厄莎的宗教仪式等等。相反对于厄莎的信仰和祭祀在拉祜族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基本上是与拉祜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灵魂崇拜等各种信仰融合在一起,在各种祭祀或者仪式活动中都能看到与厄莎有关的信仰活动。然而文化旅游需要文化具有表演性,而且如果景点过于分散很难吸引游客,因而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打造“拉祜文化名县”的过程中,将县城作为重点开发地区,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可以集中展示拉祜族的文化。于是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一轴四景观的设计中就有一个“世界拉祜朝圣地”,以展现拉祜族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这个景点位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城南214国道旁,南本河南岸小桥头村。根据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旅游总体规划文本说明书的介绍,在这个地方“打造世界上最大的金葫芦祭祀塔,来满足拉祜民族祭祀、朝拜的活动”<sup>②</sup>。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为拉祜人民提供一个朝拜神灵、寻根问祖的地方——世界拉祜朝圣地。

同时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南岭乡勐炳村打造一个称为野阔拉祜的文化村。根据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旅游开发的规划,把勐炳村建造成一个拉祜族创世的风情园。目前,初步塑造了厄莎像,建有动物跳歌的地方、雷打石、打猎祭供的地方、厄莎造天造地的地方、厄莎跳歌的地方、厄莎种葫芦的地方、扎迪娜迪谈恋爱的地方、打猎山、厄莎儿女居住地方等十个景点。竭力把这里塑造成为一个拉

<sup>④</sup> ①王磊裔:《拉祜族口传文化的族群认知功能及其流变:以葫芦故事为例》,《民族论坛》2014年第2期。(英)

②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页。

<sup>⑤</sup> ①翁乃群:《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再生产:以纳西文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关系为例》,王铭铭主编:《人文世界》第一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24页。

②《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旅游总体规划文本说明书》,第61页。

---

枯文化发祥、传承、发展之地，形成所谓的厄莎文化和扎娜文化，把原本传说中的故事在现实场景中展现。一方面是为了迎合旅游者对于原始古老等的想象，这种对于厄莎信仰的开发明显具有自我东方化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意在将拉祜族以共同的厄莎信仰凝聚在一起。

这两项旅游开发项目，最根本的用意除了吸引游客，希望能创造经济效益之外，当然还蕴含着希望能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打造成为拉祜族文化的发源地的设想。而宗教是最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文化元素，是族群身份认同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韦伯也认为基于共同起源的信仰的继嗣共同体是族群身份的关键。对本来并不存在的拉祜宗教祭祀场所，进行创造和发明，或许可以因为再造的宗教圣地，人们建立起群体的宗教认同感。当然重新构建出来的宗教圣地，能否真的在拉祜人心中具有宗教的神圣性，很值得深思。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这种再造的宗教圣地，也一定会对拉祜族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 二、快乐拉祜的形象构建

目前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向外界宣传拉祜族的一张名片是《快乐拉祜》这首歌曲，这是一首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勐根村老达保村民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曲调欢快明丽，歌词热情洋溢，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对外宣传拉祜族的主打歌曲。所以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各种宣传画册和视频里，身着拉祜族服饰的人们弹着吉他，欢快地歌唱，这已经成为新时代澜沧拉祜族的形象。

以老达保村民小组为依托，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着力打造了一个名为哈列贾（HALEJA）的乡村音乐小镇（HALEJA就是拉祜语“快乐”的意思），这个小镇包括酒井乡勐根村邦利、回塘、新村、老达保、新达保、勐根大寨、勐根小寨、勐根茶场、南波别9个村民小组，共720户，3114人，占地约8平方公里左右的地区。其定位为“国际化乡村音乐原生态旅游休闲镇，系列型乡村音乐厅及规划范围内的民族音乐文化村”，为什么要建立一个音乐小镇，这起源于老达保。老达保村是一个以拉祜族人口为主的村寨，到2011年末全村有114户464人，其中拉祜族458人，占总人口的98.7%。早在上世纪前半叶基督教传入澜沧，在拉祜族和佤族中传播开来时，老达保村民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目前全寨村民绝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由于基督教有唱赞美诗的传统，这个村寨的村民自幼受该传统的影响，能演唱无伴奏和声。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村寨的年轻人自发开始学习吉他，在村寨中形成了学习音乐的氛围。2005年起，该村先后组建了雅厄艺术团、达保兄弟组合、达保姐妹组合等艺术团体，同时在县文化部门的帮助下，这些文艺表演团体开始走出澜沧进行表演。后来参加了几次中央台的节目，从而名声大振，多次在国内外各种场合进行表演。老达保的村民确实有着非同其他民族村寨的地方，就是对于音乐的爱好，全村4百多村民当中，有100多人会弹奏吉他。而且他们自己创作了大量的拉祜语歌曲。从音乐风格来说，有些歌曲带有拉祜族传统音乐的特点，有些则是流行音乐，当然也还有基督教赞美诗的风格都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的音乐风格。

2013年6月在县里的积极推动和努力下，成立了以老达保村民为主的“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歌舞演出主要是表演老达保的多声部合唱，以及拉祜族的传统舞蹈等。县里是期望以“快乐拉祜”演出项目的运营，带动该村农特产品、传统手工艺品、民族餐饮、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总体来说，老达保已经成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一面品牌，县里的各种接待任务也会请老达保的村民进行表演。特别是将《快乐拉祜》作为拉祜族的名片，打造一个快乐的拉祜族形象。

从这一系列的规划和发展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文化构建过程。首先，老达保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拉祜族村寨。这里有拉祜族的传统文化，老达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牡帕密帕》的保护传承基地之一。有国家级传承人2人，省级传承人1人。其次，这里还有基督教的文化，老达保的音乐传统更多的是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多声部的合唱表演，是西洋音乐的传统，吉他也是西洋乐器，同时与拉祜族的文化结合，再糅入流行音乐的元素，形成了老达保的音乐特点。这样老达保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多元的形象：身着拉祜族服饰的老达保人用西洋的吉他，采用西洋的和声，用拉祜语演唱流行音乐。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老达保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而首打歌曲《快乐拉祜》更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对外宣传拉祜族的一张名片，于是澜沧拉祜族的形象就被定位为“快乐的”。但实际上，拉祜族是一个性格内敛且害羞的民族，在

各种文献当中所记载的拉祜族都是一个饱经战乱和逼迫的民族,南栅的佛堂遗址也在诉说着曾经的苦难。而在目前对老达保的规划当中,却被塑造成为一个“快乐的”拉祜形象。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着旅游发展的缘故,所赋予拉祜族的新想象,也满足游客对于少数民族的想象,那是快乐且能歌善舞的“异邦”,从而构建了一个“快乐拉祜”的形象。

### 三、拉祜族的文化再生产与民族身份的想象

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在将民族文化作为旅游开发的产品时,文化必须与大多数群体的文化构成差异才具有吸引力。在这个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拉祜族的文化必须是“奇异的”、“少数的”、“原始的”、“古朴的”,如此才能满足来自都市和大多数群体的游客对于异文化,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在这样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作为具有权力话语的地方政府在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方向的指导下,主导着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希望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包装和塑造,使其具有可表演性和展示性。而地方知识精英作为行动者,他们熟悉民族文化,也了解哪些民族文化可以成为展示的舞台化文化产品,因而他们在政府的主导下,对民族文化进行包装和塑造,成为旅游文化产品的设计者。当然作为民族文化的主体——当地人在这样的行动实践当中也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们作为行动者之一,也参与到这样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与地方精英“合谋”推动着文化的再生产。同时当地人将这些重新生产出来的文化展示出来,使再生产出来的文化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展现在游客面前。游客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有一种想象,比如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活泼外向的,因而拉祜族族形象就从“害羞”和“内敛”被塑造成“快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个过程中游客所扮演的是另一行动主体,游客也与当地人和地方精英一起,成为行动者,共同合谋来推动文化的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拉祜族作为少数群体与旅游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族群关系,就是看的主体与被看的对象,即看与被看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群体关系。<sup>⑥</sup>在这样的文化展演过程中,游客与拉祜文化展示者双方在不断强化着各自属于不同群体的意识,拉祜族是与游客的群体,或者说与大多数群体不同的异邦的群体。而这些再生产出来的拉祜族的文化特征,也就成为拉祜族与游客群体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因而成为拉祜族的共同文化认同。在这样的文化展演过程中,由于“我”与“他”的不同时刻在提醒人们看与被看双方的不同,不断刺激人们的身份意识,从而使民族身份不断得到强化。

同时在澜沧本地,当澜沧政府以拉祜族文化开发旅游业的时候,必然突出拉祜族与其他民族的相异之处,那么拉祜族的一些文化元素就在这样的文化再生产当中被刻意放大和凸显出来。原本在多民族聚居地区,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成分很多,但是这时,文化有了清晰的边界,原本民族之间模糊的地带在逐渐消失,民族之间的边界在逐步清晰。比如拉祜族的“扩塔节”,其实和汉族等民族的春节是同一个节日,节日期间的风俗尽管有所不同,但相同的地方更多。为了凸显拉祜族的“扩塔节”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春节,于是祭祀天神厄莎,相互拜年等风俗就被加以创造和改进,以显示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然而这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尽管由于过分强调多民族聚居地区各自文化的独特性,使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边界在逐渐清晰。但同时,无论是“扩塔节”还是“葫芦节”虽然是拉祜族节日,但是节日期间,并不是只有拉祜族才进行节日的文化表演和展示,而是澜沧所有的民族都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游客对拉祜族的文化消费并不仅仅局限于拉祜族,而是针对整个澜沧的各民族,因而游客对于澜沧拉祜族的文化消费也成为一种地方性认同。

当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着力打造“世界拉祜文化中心”的时候,所考虑的并不只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拉祜族,而是世界整个的拉祜族。对澜沧拉祜族的文化再生产,期望塑造一个“典范的拉祜族文化特征”,这样的文化再生产,构建起全世界的拉祜族共同的血缘和文化联系,塑造全世界拉祜族的共同文化特征和身份特征,从而成为地方文化走向世界的契机。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拉祜族作为云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之下,确立起来,成为与其他55个民族一样的中国的民族之一。拉祜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族群边界在国家的民族话语体系下固定下来。同时,作为民族身份的重要要素之一——文化特征也在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形成“典范的拉祜族文化”,尽管这种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并非单一只是在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而更多的是在国家民族政策的话语体系下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的缘故。但是不可否认,进入到21世纪之后,

<sup>⑥</sup> ① 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文化作为消费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的介入,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缘故,不同的文化在文化的再生产和文化消费过程中,不断彰显和塑造自己的典范文化,从而进一步强化民族边界和自我的身份认同。